

韩存志 主编



资深院士回忆录

第2卷

裘维蕃等著

韩存志 主编

第2卷

裘维蕃 等著

资深院士回忆录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 昀 李向红
装帧设计 赵小卫

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

韩存志 主编
裘维蕃 等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5)

网 址 www.ewen.cc
www.sste.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75
插 页 1
字 数 365 000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5428-2467-8/N·406
定 价 30.50元

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

顾 问

吴阶平

周光召

朱光亚

编委会

主 编

韩存志

副主编

傅克廉

编 委

王勇彦

张江民

目录

裘维蕃·

追忆菌物学大师戴芳澜院士二三事 1

- 一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 /4
- 二 培养学生的自学和思考能力 /5
- 三 亲自讲授并指导菌物学试验 /5
- 四 严谨的科学态度 /6
- 五 作风正直的良师益友 /7
- 六 发展微生物学科 /8
- 七 文娛兴趣 /9

任美鏖·

回忆与怀念 11

- 一 前言 /13
- 二 中学初读地理书 中大师从张其昀
(1929~1930年) /13
- 三 赴格城师从贝利 习地质加深基础
(1936~1938年) /14
- 四 读“红星”萌发救国志 办“旗日”格城
遂夙愿(1937~1938年) /16
- 五 古庙青灯建大学 博学鸿才聚陋室
勤学苦研求真知 东方剑桥美名扬
(1940~1943年) /20

- 六 四教授考察西北 白龙江死里逃生
(1940年) /24
- 七 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
(1944~1946年) /25
- 八 为橡胶深入勐龙 雨林中巧解难题
(1958年) /30
- 九 选港海南岛 现场见分晓
(1963年) /31
- 十 十年“文化大革命” 生死只在一念间
(1965年) /32
- 十一 昔日谈判对手 今天学术好友
(1979年~现在) /34
- 十二 一只眼睛失明 今后如何工作
(1979年) /36
- 十三 黄河口比选海港 东营市“舌战群儒”
(1984年) /37
- 十四 访美观感(1978~2000年) /38
- 十五 现代的伯乐与千里马——曾荣与束星北 /47
- 十六 胜利油田的好书记——李晔同志 /49
- 十七 深切怀念南京大学的好校长、好书记——郭影秋同志 /50
- 十八 《中国自然地理纲要》的风波
(1980年) /52
- 十九 接受维多利亚奖章(1986年) /54

张 涤 生

开拓创新为人民

57

- 一 首次突破烧伤治疗“禁区” /62
- 二 巧摘“巨瘤” /63
- 三 “卷筒技术”造阴茎 显微外科创
新篇 /65
- 四 肠管搬家代食道 /68
- 五 改头换面换新颜 /70
- 六 头皮撕脱长秀发 /72
- 七 祖国医学辟蹊径 烘绑妙治“大
脚疯” /74
- 八 心脏造房“设计师” /76
- 九 展望未来 /78

郑 国 锴

往事杂忆

83

- 一 怀念我的导师 /85
- 二 在美国上学 /89
- 三 回到祖国 /91
- 四 选择了兰州 /95
- 五 建设兰大生物系 /97
- 六 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100
- 七 国内首创细胞生物学专业 /117
- 八 历史的巨变 /119

陈述彭 ·	浙大史地系——12 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	123
-------	------------------------	-----

- | | |
|---|--------------|
| 一 | 引言 /125 |
| 二 | 顽强的幸存者 /126 |
| 三 | 全面的素质教育 /129 |
| 四 | 实践出真知 /133 |

陆宝麟 ·	走上研究蚊类的道路	137
-------	-----------	-----

- | | |
|---|----------------|
| 一 | 从鸟到虫 /140 |
| 二 | 昆虫起步 /141 |
| 三 | 云南抗疟 /145 |
| 四 | 耿马跋涉 /146 |
| 五 | 双江调查 /149 |
| 六 | 金平漫记 /151 |
| 七 | 走上研究蚊类的道路 /153 |

张光斗 ·	我的片断回忆	155
-------	--------	-----

陈秉聪 ·	脚踏坎坷路 心系祖国情	165
-------	-------------	-----

- | | |
|---|----------------|
| 一 | 孜孜不倦求知报国情 /167 |
| 二 | 朴素的爱国情 /172 |
| 三 | 创业 /173 |

陈太一

- 四 甘为人梯育英才 /178
- 五 风雨人生和科学春天 /179
- 六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183
- 七 结束语 /184

平凡、坎坷、幸运人生——八旬
回忆

187

- 一 序：我生于这个时代 /189
- 二 生于苏州 长于宜兴 /193
- 三 八年抗战 颠沛西南 /228
- 四 矢志不移 迎来解放 /282
- 五 投笔从戎 塞外耕耘 /295
- 六 关中五年 创业维艰 /312
- 七 奉调进京 任重道远 /342
- 八 十年动乱 艰苦工作 /377
- 九 山重水复 柳暗花明 /404
- 十 六旬南下 重操旧业 /439
- 十一 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453
- 十二 病中记忆 /472
- 十三 后记 /493

编后记

追忆菌物学大师戴芳澜院士二三事



裘维蕃

真菌学家、病毒学家。1912年5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2000年9月18日逝世于北京。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44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1948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植物病理专业主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他长期从事真菌学研究,是国际上最早发

现真菌异核现象者之一。在戴芳澜教授的指导下,他对真菌的分类、生理和栽培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还开展了植物病毒学和生物诊断的研究工作,在十字花科和茄科蔬菜作物的病毒病理学及其防治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和华北小麦丛矮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作了系统的研究;研制出NS-83增抗剂,用以抑制蕃茄、烟草等作物的病毒感染,增产效果显著。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我从1932年和恩师戴芳澜院士相识到1973年恩师辞世,先后交往达42年,我对他的一言一行印象深刻,这也影响到我的为人和治学,至今回忆犹令人景仰不已。至于我和戴师的来往书信,因历时已久,多已散失,特别是在文革中被付诸一炬。我想凭我的回忆,也许还可以让读者了解他的一些言行美德,而这个回忆也许比他的书信更有意义。

1931年我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植物病理学系,按理学院生物学系的课程读完第一年,开始选习专业课程,特别是植物病理学。当时,该课程由农学院的戴芳澜教授讲授。实际上当时南京金陵大学的理学院要设置植物病理学系,而农学院则力争该系应设在农学院,故入学时理学院和农学院都招收植物病理学系的新生,这就是我为什么进入理学院的原因。

要选读植物病理学,就得去农学院找植物病理学系主任戴芳澜教授。我当时浑浑噩噩,很天真地拿着理学院一年级的成绩簿赶到农学院的二楼,问到戴芳澜教授的办公室,叩门进去,看见一位中年教授正伏案工作,听见我进去,他抬头问我何事,这时我才看清他清秀的容貌和炯炯有神的目光。我说我是来选读植物病理学课的。他问我是哪一院的学生,我说是理学院的。他说只有农学院的学生可以选读此课,我必须先转院,才能选课。我只得赶到校部去办了转院手续,再回到戴教授的办公室,这时他接过我的成绩簿,仔细地看了一遍,才问我为什么要进植物病理学系。我说:我从小喜欢植物,曾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高等植物学》,其中有一章“植物病理学”,我虽然看不大懂,但觉得这是一门非常有意义的学问,我想知道它,也许将来能为农作物看病,因为我幼年在农村外祖家时,的确曾看到农作物会病会死,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这一切,所以选了这个系。听完我的陈述,戴教授对我微微一笑,同意我进入植物病理学系,并签名让我选读植物病理学这门课。

一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

植物病理学是整个农学院学生都必须读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因此上课时我发现整个课堂坐满了来自不同系别的学生。戴教授进来时目光环视,全堂鸦雀无声。那时教授进课堂还没有学生起立的规矩,不过学生都严肃安静,以示敬意。他的第一句话便是:“植物病理学原来是专讲植物发病原理的,但是你们现在还没有认识植物病害的外在状态,我就来讲发病的内在理论,你们则不容易理解,所以我选定了先讲10余个有代表性且在经济上有其重要性的农作物病害,通过认识这些病害把它们的发病原因讲清楚,这样涉及到发病的内因和外因、病害发展的理论和规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戴教授讲授这一课程的方法确实是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明白生动,博得了不同系别学生的好评。这一方法确实和解放后采用的苏联的教学方法相反。苏联把理论部分改为“普通植物病理学”,把病害部分改为“农业植物病理学”,而且把理论部分讲在先,实际病害部分讲在后,真是本末倒置,其后果是这两门课程都不得不扩充内容以满足学时的要求,因此理论部分不免夸夸其谈,而实际部分不免增加许多农作物次要的或不重要的病害以充数。由于其中有许多发病规律大都相同,讲者自觉困扰,听者也感厌烦。为了让多余的教师都有工作做,学校明知这种教法有问题,却始终未改进。这也是苏联提倡的所谓要满足教师“工作量”问题起的作用。后来我在讲授“农业植物病理学”的10余年中,受到这种制度的束缚,常常内疚。虽然同学们还不讨厌我的讲课,但是我总觉得辜负了恩师关于讲授植物病理学合理的顺序观。

二 培养学生的自学和思考能力

戴师的课堂讲授可谓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但是他开列的参考书却有相当的数量,同时他还自己摘编当时国际上已经发表的最新资讯,印发给学生参考学习,使学生能及时了解他讲授的有关国际上的新发展。当然,学生也可以到图书馆去阅读他指定的有关材料,以扩大知识面。在课堂上他也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回答,一方面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测试学生是否涉猎过一些他指定的参考书。这种学习方法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后来我去国外学习就遵照恩师指导的方法进行,深感受益匪浅。

三 亲自讲授并指导菌物学试验

菌物学(mycology)那时称真菌学,这是因为植物病理学中接触的病原菌都是真菌,因此国内便把 fungi 一词译成“真菌”。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已经把真菌和其他菌物区别得非常清楚,并认为此类生物不属于植物,而且和动植物有平行的界别,因此有必要改译为“菌物”。日本原译为“菌类”,但所谓菌类,还包含另外一些界别的微生物,如细菌和放线菌。日本菌学界权威平塚直秀院士曾表示汉译 fungi 为“菌物”远比“菌类”更为确切。戴师当时讲课时就说明:“他讲的真菌学的内容也包括一些非真菌的东西。”

真菌学这门课当时只是植病专业的必修课,可是当时植病系仅两个学生,因此也接受其他系的学生来选读,其中有农学系一人,园艺系一人,土壤系一人,金陵女大借读生一人,连我共 6 人(这是戴师在金大最后一次开真菌学课,因为此后他就应聘去

清华大学了)。

戴师除了讲课还兼管实验指导,工作要持续4个小时。他亲自准备实验用的材料,解释实验的程序和方法,以及实验中应注意的问题。学生操作时,他便坐在实验室的一角,独自看书,隔些时候离开座位,看看学生的操作,并指出他们应改进的地方。实验做完后,把作业交给他,经签字后,方可离开,个别的还要重做。当时戴师已是国内名教授,但他从不摆架子,不用讲师或助教来帮助课堂实验指导,足见他执教的认真。

戴师非但重视课堂实验,还时常亲自带领同学到野外去采集标本,并随时指导同学到适当的地点去寻找某些植物群落,以便找到某些寄生菌和共生菌。有时发现一些特殊的菌物时,他还会讲解这些菌物的性能和相关的故事,引起同学对菌物极大的兴趣。我至今还记得他讲的有关朱红栓菌的故事及其奇妙的医疗作用。他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四 严谨的科学态度

戴芳澜教授在教课之外,全部时间都用于科学研究。最初他调查了我国农作物的病害及其致病的病原真菌,写成名录发表,以便后人查考,那时国内还很少有这样的资料。随后就对某一科属做深入细致的收集和研究。他对某一个有新特点的标本,先从国内已有的资料中查证,如果有怀疑,便向国内外专家咨询交流,并索借标本加以进一步验证。据我记忆所及,他曾和美国的丘普(C. Chupp)讨论过尾孢菌,和卡明斯(G. B. Cummins)交流过锈菌,和意大利的奇费里(R. Ciferri)讨论过有关腥黑粉菌的问题,和印度的孟德克(B. B. Mundkur)交流过有关黑粉菌问题,还经常和日本的平塚直秀院士交流有关两国锈菌的问题。据我所知,他发表竹多腔菌的论文前,曾和国外的许多专家通过

书信往来加以讨论。如果这些书信还存在的话,应该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除真菌分类外,他在1934年曾去美国纽约植物园和道奇(B. O. Dodge)开展了真菌遗传学研究。记得1933年秋冬之交,为了寻找白粉菌目的经典材料[1900年萨蒙(Salmon)和1933年布卢默(Blumer)的著作],他亲自从北平来到南京,让我为他从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查找,并把全文抄打下来,带回参考。戴师一生为我国鉴定并发表了许多真菌新种,其中绝大多数都为国际所认可。当然限于当时我国的条件,个别鉴定可能有误,但他很乐于他的学生后辈给予更正。

现在个别科学家喜欢把别人的研究工作写出的论文,在合作者中附个名字,不管自己是否在该研究工作中参与过咨询或具体指导过设计。戴师则一贯主张“论文列名要实事求是,和自己不着边际的论文切勿附名”。1944年我有两篇关于高等担子菌的论文是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写成的,我认为理应写上他的名字。在送到国外发表前,经过他审阅时,他命我不要把他的名字附上,但乐于为我推荐到国外权威杂志发表,戴师的为人于此可见一斑。

五 作风正直的良师益友

和戴芳澜教授相处,不觉得是和一位严师在一起,却如同是和一位知心朋友在一起,可以无所不谈,从谈一门学科的发展,到评论当今学术界的风气。闲谈之中,还能获得许多知识。我感到他疾恶如仇,那时他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他的言论和观点是偏向共产党的。他的研究生中就有些是地下党员,有些则具有进步思想,甚至有访问过延安或直接去延安工作的。

戴师一贯重视培养各方面的人才。1940年我从金大到福建永安协助筹建一所农学院(抗战时期在福建山区草创的一个农学院,即现在福建农大的前身)。他知道后认为此非我所长,因此建议我去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为的是让我不要中断对菌生物学和食用菌的研究,这也促使我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云南的大型真菌的研究做出一些成绩。当时跟随他进行研究工作的还有吴征镒(短期研究锈菌)、沈善炯(短期研究水生菌)等。

六 发展微生物学科

戴师对于微生物学科的发展并非只限于他自己专长的一支。自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以后,先后融合



图1 1953年5月,戴芳澜六十寿辰纪念。前排右一周家炽、右二戴芳澜、右三戴夫人,后排右三裘维蕃、右四裘夫人。

了细菌学,增加了放线菌学,发展了发酵微生物学,创建了植物病毒研究室、地衣研究室和菌种保藏研究室,同时建立了一个与